

基于来华传教士所著文献的 汉语词汇研究概说

林 佳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利用来华传教士所著文献资料开展的汉语词汇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 外来词与新词研究; 西源学科名称研究; 专书词汇研究; 西汉对译词典研究。研究成果丰硕, 同时也存在薄弱环节, 如基于词汇学理论的分析不足、缺乏阶段性的范式总结。此外, 研究者的双语素养、西汉文化素养也需要提升。

[关键词] 传教士文献; 汉语词汇;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H1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 (2019) 02-0080-04

从明朝万历年间起, 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相继入华, 中国与欧洲的接触突破了器物层面的交流, 拉开文化与思想碰撞的序幕。传教士长期生活在中国, 传教之余进行大量的著述与翻译活动。据统计, 相关中文著书达700余部, 相应的西文翻译、著书出版机构超过100家。这些丰富的笔记、辞书、译著等文献资料, 既成为研究教会发展、中西交流、明清历史等方面的重要参考, 也为近代汉语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思路, 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传教士语言学(The Missionary Linguistics)也由此诞生。本文简要总结利用来华传教士文献资料开展的汉语词汇研究, 以期对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传教士语言学研究做出有益补充。

一、外来词与新词研究

明清之际, 来华传教士的母语与汉语的接触为汉语输入了丰富的外来词汇, 促成了大量汉语新词的产生。明万历年间(1607), 利玛窦和徐光启在合译《几何原本》时便创制出许多新词以对译外语词汇。因此, 学界同人对来华传教士文献进行词汇研究时, 首先聚焦的, 便是外来词输入与新词创制问题。

意大利学者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的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1997)一书, 考察了1840年至1898年间汉语词汇的嬗变, 并试图分析19世纪中晚期的借词、译词以及新创制的词语对现代汉语词汇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马西尼的研究开启此类研究的先河, 但是“该书对其所认定的许多外来词和新词和源流考查, 还不够精审, 有不少‘始见于’的提法实不免流于轻率”^[1]。罗其精(1999)考证出其中“外交部”“外语学校”“数学”“消息”等词语的首见例证不准确, 许多本属汉语固有名词被误认为是外来词, 如“银行”“飞车”“火轮”等词语。新世纪以来, 张照旭(2011)、王文琦(2012)、刘玲玲(2014)、马倩(2015)等人的学位论文均以此类外来词或新词为研究对象。他们考察的历史时期各不相同, 参照的文献材料也各有侧重, 但是他们在梳理外来词发展演变历程的基础上, 都观察到这些词被吸收进汉语词汇系统时发生的“本土化”演变, 同时还探讨了外来词的发展与社会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利玛窦来华, 到康熙禁教、耶稣会解散, 一百多年间, 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凡437种, 其中纯宗教书籍251种……自然科学书籍131种”^{[2](P38)}。可见, 宗教、科技词汇是

[收稿日期] 2018-12-20

[作者简介] 林佳,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汉语史、汉语方言。

当时外来词输入的“先锋”与主体，相应的，学界关于此类词汇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

对来华传教士文献进行的宗教词汇研究，张西平《马礼逊〈汉英英汉词典〉中的基督教词汇研究》（2009）实启其端，他的《简论罗明坚和利玛窦对近代汉语术语的贡献——以汉语神学与哲学外来词研究为中心》（2013）则分析了罗明坚、利玛窦中文著作中有关神学、哲学的新词，对于明清两代汉语神学概念的演变做出梳理。王铭宇《明末天主教文献所见汉语基督教词汇考述》（2013）以教会文献（1582-1644）中的汉译名词为对象展开研究，重点考察沿用至今的86个专有名词。马云霞《早期传教士作品中的新词创制》（2015）将明末清初圣经译著、教会讲义中所见的新词分为三类：音译性的新词、词汇性的新词、根据中国传统观念与汉语习惯创造出的附会性用语。关于单个外来词的源流考辨，或单种文献中的新词考证，王铭宇《“天主”词源考》（2012）做了很好的个案示范。文章详细考证“天主”一词的来源，以及该词在中国、菲律宾、日本等国的创制经过。除了上述作品以外，朱振伟（2009）、樊慧颖（2015）、荣喜朝（2018）等人的研究成果也值得重视。

关于科技类外来词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目前可见的仅有梅晓娟（2007）、夏晶（2011）、李军（2015）等人的数篇作品。

二、西源学科名称研究

明清两代，以“西学六科”为代表的西方学科体系被来华传教士引入中国，一系列西方学科的汉译名称也随之产生。这些学科名称成为当时汉语外来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近现代的学科名称创制提供了重要参考。以这些西源学科名称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专著为数甚多，我们大致将其分为两类：

一是对学科名称的发展进行整体研究。德国郎宓榭等人所著《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2012）一书考察了晚清之际传教士著作中新概念、新术语的产生及本土化问题，内容涉及近代中国的哲学、政治学、逻辑学、语言学、物理学等多个学科。刘天芳的学位论文《明末清初（1582-1724）传教士中文文献中的西方学科分类名称研究》（2016）选取28位来华传教士所编著的91种文献为研究对

象，从翻译方式、结构类型两个方面对文献中所出现的西方学科名称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梳理这些学科名称在清代中后期来华传教士文献中的演变轨迹，并讨论了它们对近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同类研究成果还有肖朗（2009）、周荐（2017）等人发表于期刊的单篇论文。

二是对某学科专有名词进行的研究。以医科为例，李传斌（2005）梳理了合信、嘉约翰、柯为良等一批医学传教士对中国医学名词的创制所作的努力。“1890年前，他们的医学翻译就确定了一些中文西医名词。1890年后，他们进行了有组织的医学名词统一活动”^[3]。余静斐的学位论文《中医词语早期的英译研究——以马礼逊〈华英字典〉为考察对象》（2012）从马礼逊《华英字典》中筛选出与医学有关的词条分为十大类，并细致分析马礼逊对中医方剂名称、中药名称以及中药性能的翻译特点及翻译得失。近年来，法律、生物等学科的专有名词也获得研究者的关注。屈文生（2012）考证并分析了麦都思和罗存德著作中的法律词语，以探究英语中的法律词语译入汉语时的早期面貌。李亚鲁（2017）以我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植物学著作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植物学术语的译名特点和汉化路径，并针对现代汉语中植物学术语的制定、规范以及相应词典的编纂等工作提出建议。

三、专著词汇研究

以来华传教士的专著为对象的词汇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以利玛窦为例，他是第一批来华传教士中的领袖人物，也是第一位钻研中国典籍并作译介的西方学者。利玛窦在华二十七年间著述颇丰，其本人对汉语词汇的发展也做出积极贡献，“主要表现在推动汉语复音化进程，促进附加式构词方式的发展，给汉语旧词灌注新义三个方面”^[4]。李瑾（2010）、刘晶晶（2017）的学位论文均以《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为研究对象，但侧重点不同。李瑾的论文侧重于分析《著译集》中外来词的译借方式与构词方式，以及这些词的语义范畴。而刘晶晶的论文则以《著译集》为语料来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嬗变。此外，黄铭石也对利玛窦的中文著译进行研究，其学位论文《利玛窦中文著译中的术语及专名研究》以引入方式为标准将利玛窦著译中的术语和专名分为三类，并进一步分析这些术语、专

名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威妥玛^①及其所著《语言自述集》也备受学界关注。《语言自述集》收录了大量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口语词汇，具有极高的语料价值。党静鹏《〈语言自述集〉的词汇学价值》（2011）讨论了该书在文献资料、北京话词汇史、词汇学理论等方面的积极贡献。吴晓芳的学位论文《〈语言自述集〉词汇专题研究》（2017）搜集《自述集》中的北京话特有词汇，以此为基础进行构词方式、后缀、固定语、逆序词和离合词等方面的研究，并与《北京话词典》进行比较，探究百年来北京话词汇的演变。薛佳菁的学位论文《〈语言自述集〉的词语教学与文化认知研究》（2018）则通过对《自述集》的文本内容进行梳理分析验证，探究词语教学与文化认知的关系。此外，郝颖（2006）、张敏（2011）等人也对《自述集》中的词汇做出积极探索，有单篇论文面世。

除了利玛窦、威妥玛以外，另有狄考文、艾约瑟、艾儒略、狄文爱德等传教士及其著述也在近年来受到研究者关注。钱鸿儒（2013）、齐灿（2014）、赵欣（2015）、傅永莹（2016）等人的学位论文便是以上述传教士的作品为研究对象进行词汇研究。

四、西汉对译词典研究

来华之初，欧洲传教士“苦于风土人情不谙，语言文字之隔膜”，语言学习便成为当务之急。这激发了对于汉外词典这类工具书的需求，因此传教士编纂了大量的综合性双语或多语词典。这些词典曾是传教士学习汉语的重要资料，如今则成为勾勒明清时期汉语面貌的重要证据，新世纪以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研究者首先进行的工作是细致的词典书目整理，这项作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黄奇芳《粤语词典出版概况》（2000）分类整理了近两个世纪以来所出版的粤语—外文双语对照词典共53部，其中，逾半数为晚清入华传教士所编著。游汝杰广泛搜集海内外的传教士文献，撰成《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2002）一书。钱乃荣《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究》（2014）聚焦传教士所编著的上海方言著作，借助这些语料分析19世纪以来上海话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变化。海外学者也做出

巨大贡献，目前可见的此类著作有法国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1995）和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1995），以及英国伟烈亚力《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2011）等。

《葡汉辞典》由罗明坚和利玛窦共同编写（1584-1586），该书被认为是来华传教士所编辞典的开端。王铭宇（2014）分析了《葡汉辞典》中的宗教、方言以及官话词汇，认为《葡汉辞典》所记录的“明末官话的基础词汇已与现代汉语通用语词汇相差无几”^[5]。随着研究者对传教士文献的不断发掘，一些新观点也逐渐产生。张嘉星《欧洲人汉语辞书编纂始于闽南语辞书说》（2013）通过探讨明中叶以来欧洲传教士汉语教育之方言取向，描述西方教会“闽南—台湾—南洋”之“大闽南语区”闽南语研习过程，得出“欧洲的汉语辞书编纂是开源于闽南语辞书的”这一结论^[6]。

近年来，学者对单一辞书中的词汇问题进行深入考察，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一些学位论文之中。徐睿渊《厦门方言一百多年来语音系统和词汇系统的演变——对三本教会语料的考察》（2008）利用英语和厦门方言的双语对照文献考察了19世纪下半叶至今厦门方言词的演变与影响因素。马睿颖《〈福建方言字典〉中汉语借词的翻译方法研究》（2009）以《福建方言字典》所收录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借词为例，分析了麦都思对音译、意译及半音半意方法的使用规则。杜晓萍《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所撰福建闽南方言文献语音和词汇系统研究》（2011）选取《漳州方言词汇》等7部19世纪传教士编撰的闽南方言文献，分别考察了当时厦门、漳州、漳浦、泉州等四个地方方言词汇系统的历时演变并做共时比较。在期刊论文方面，马重奇《十九世纪初叶福建闽南方言词汇研究——英·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词汇研究》（2009）将《福建方言字典》中的2120个词条进行概括，分为二十二个大类，并分析了这些词语的两读之间存在的文白异读、训读等关系。他的《英国传教士戴尔〈福建漳州方言词汇〉研究》（2013）则重

^① 威妥玛在中国40年（1842-1883），是著名的英国外交官、汉学家，并不属于传教士群体。《语言自述集》也是为英国使馆译员的培训而编制，但是对同时期及之后来华的传教士影响深远，因此纳入本文讨论的范围。

点整理、分析了1800多条漳州方言词汇。马重奇先生的研究为还原19世纪初期漳州方言词汇系统的面貌做出积极贡献。李伟芳《马礼逊〈华英字典〉日常用语和俗语收译研究》(2014)对《华英字典》中的日常用语和俗语进行归纳分类,并对其英译表达的翻译手法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徐时仪《明清传教士与辞书编纂》(2016)也对《华英字典》做了重点剖析。

五、余论

通过对研究现状的整理与分析,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来华传教士所著文献的关注正在加强,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涌现。然而,我们也发现了当前研究所存在的不足。这些不足表现在:首先,考述丰富而分析不足。以外来词为例,研究成果更多集中于对来华传教士译著中的外来词、新词做搜集、整理,而在语言学理论框架下对外来词翻译、接受机制等方面进行的分析尚有不足。究其原因,研究者中以对外汉语教学、国际汉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学术背景者居多,而以汉语词汇研究为专长的较少,具备

精深的西、汉文化背景的学者更少。因此,在涉及文化负载等一些比较复杂的词汇现象时,研究便难以深入。其次,个案研究有余而整体归纳不足。现阶段的研究大多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摘取不同的文献进行探究,暂时未见研究范式的总结,这不利于更大范围地凝聚研究力量。基于传教士所著文献的汉语词汇研究,需要学界同人继续努力。

[参 考 文 献]

- [1] 黄兴涛. 近代中国汉语外来词的最新研究——评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J]. 开放时代, 1999(5).
- [2]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修订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3] 李传斌. 医学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西医翻译名词的确定和统一[J]. 中国文化研究, 2005(冬之卷).
- [4] 向荣. 论利玛窦对汉语词汇发展的贡献[J].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12).
- [5] 王铭宇. 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词汇问题举隅[J]. 励耘语言学刊, 2014(1).
- [6] 张嘉星. 欧洲人汉语辞书编纂始于闽南语辞书说[J]. 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Summary of Chinese Vocabulary Research Based on the Works Written by Missionaries in China

LIN Jia

(School of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vocabulary based on the workswritten by missionaries in China mainly focuses on four aspects: the study of loanwords and neologisms; the study of subject names from western sources; the study of monograph vocabulary; and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dictionaries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fruitful, but there are also weak links, such as lack of analysis based on lexical theory, lack of periodic paradigm summary. In addition, researchers' bilingual literacy and cultural literacy also need to be improved.

Key words: workswritten by missionaries; Chinese vocabulary; research summary

[责任编辑 薄 刚]